

上 编 唐 诗

第一章 唐诗概述

第一节 唐诗发展概况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强盛时期。唐诗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向来为世界人民所瞩目。

唐诗作品多、作家多，《全唐诗》及其补编共收诗 50000 余首，作家 3600 多人，其中，历代相传的名作有几百篇，为历代文坛公认的著名诗人有几十名，“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通俗诗人白居易为世界公认的大诗人。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韩愈、李贺、刘禹锡、李商隐、杜牧等作家以其辉煌的创作成绩获得后人广泛的称赞。在他们之中形成的诗歌流派（如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奇险诗派、通俗诗派等）对后代文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唐诗作品题材广泛，举凡当代发生的国家大事、社会风情、民间习俗、各个阶级各个阶层和各个民族的生活与斗争，以及传统的文学题材如边塞、山水、田园、咏史、咏物、言情、酬赠等等，都成为唐诗表现的对象。

唐诗表现手法丰富多采，风格多种多样。或以叙事见长，或以抒情取胜；或清水芙蓉，不假雕饰，或锦绣雕栏，精工锤炼；或雄奇奔放，或纤巧幽丽……是我国古代诗歌表现手法与诗歌风

格的集大成。

唐诗诗体完备。古典诗歌中的各种体裁在唐诗中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不仅保留了前代的四言诗、五言古诗的体制，而且还创造了五、七言律诗、排律、绝句，并使七言歌行体诗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的作家还写出大型组诗，或长篇巨制。为数不多的史诗也颇为后代所注意。七言绝句颇易合乐，为后来的新诗体——词起了催生的作用。

总之，唐诗的辉煌成就是空前的。这对后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唐诗的发展与成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唐诗研究者对唐诗发展的分期有种种划分法，其中，“四唐”划分法最为通行。“四唐”即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这是宋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来的。他说：“以时而论，则有……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明高棅《唐诗品汇》在此基础上，将大历和元和两段合而为中唐，说：“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不同。”此后，“四唐”划分法为一般文学史编写者所采用。下面，用“四唐”划分法对唐诗的发展概况加以简单介绍。

初唐时期（618—712）：

这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也是唐诗进入兴盛的一个准备阶段。

初唐诗歌是由齐梁诗歌的靡靡之音向盛唐诗歌的豪爽激昂的过渡。它一方面努力抛开齐梁诗坛宫廷诗歌的陋习，一方面又与齐梁诗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的杰出之作则不受齐梁诗歌轻内容、重形式这种不良风尚的影响，而又能从齐梁以来的声律理论和实践中获得启发，呈现出新的面貌。

初唐早期的诗歌明显地带着南朝诗歌的痕迹。“贞观之治”

20多年间，在诗坛上有影响力的诗人是一代名臣魏征、一代君主李世民和一代宠臣上官仪。魏征的诗多为奉和应制之作，缺乏文采。李世民的诗颇多个人打江山、建功业方面的内容，但形象不够鲜明。上官仪的诗多属宫廷诗，承袭齐梁诗歌风尚，偏重形式，在诗句组合上提出了“六对”“八对”的主张，一时从者甚众，号为“上官体”。而同时期的诗人王绩却专以田园隐逸为题材，诗风质朴独特，诗僧王梵志写了不少诗歌宣传佛理，讽世劝世，也有一些反映民间生活之作，语言浅近俚俗，时夹谐趣。

初唐后期的诗歌有较多的变化。与上官仪同时而稍后的“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诗歌冲破了“上官体”的束缚，题材扩大了，内容深化了：从宫廷扩展到市井与塞漠，从歌颂帝王功德、描写生活琐事扩大到表现士子的志向、民生的疾苦和社会的弊端。在形式上，王、杨的五律为律诗的定型起了促进的作用，而卢、骆的七言歌行正奇峰凸起，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风貌。但“四杰”受齐梁诗风的影响也不小，他们的地位和创作还难以在诗坛上产生改变诗风的号召力。稍后的陈子昂在武后时期脱颖而出，批评齐梁诗风，肯定汉魏风骨、正始之音，主张诗歌应该是风骨、兴寄、声韵的统一，还写作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诗篇，成为当时诗坛上的革新者，对当时及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陈子昂同时的诗人沈佺期、宋之问的诗歌除了宫廷诗之外，还写了反映自己贬谪南方经历的诗篇，是唐代较早以诗描写南国风光习俗的诗人。“沈宋”的重要贡献是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使律诗定型化。与他们同时活跃在诗坛上的还有“文章四友”（杜审言、崔融、李峤、苏味道）和刘希夷、张若虚。“四友”的作品多属宫廷诗范围，其中以杜审言的作品较佳，其五律颇多符合格律规范。刘、张则以长篇歌行名世。

由上可知，初唐诗人主要有两类：一类以宫廷官员为中心，

主要是魏征、李世民、上官仪、“文章四友”、沈佺期、宋之问；一类以中下层文士为中心，主要有“四杰”、陈子昂、刘希夷、张若虚。此外还有一类是隐士和诗僧，主要是王绩、王梵志。这三类诗人之中，成就最显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第二类，其中尤以陈子昂为最重要。

盛唐时期（713—770）：

这是唐代诗歌发展到鼎盛的阶段，诗坛上出现了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局面。盛唐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全盛时期和由盛转衰时期（即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面貌，表现了人们对社会安定、国家富强的自豪感，对个人报效国家的强烈愿望，对祖国壮丽优美山河的赞美，同时，也暴露了许多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如贫富悬殊、战争祸害、奸佞当权、英才见疏等），揭示了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全方位地反映时代风貌，深刻地表现各种社会角色的心路历程，形成了响亮厚重的“盛唐之音”，体现了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是盛唐诗歌价值的重要一面；诗歌意境浑厚，韵味无穷，体裁完备，风格多样，这是盛唐诗歌价值的另一重要方面。

从创作队伍看，盛唐有杰出的群体优势。诚如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叙》中所说，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王昌龄、高适、李颀、常建等大家、名家，形成了“盛唐之盛”。其实，除此之外，能自树一帜的名家尚有可观的数目。这样璀璨的诗坛群星在唐代社会鼎盛时期及其转衰时期的几十年里出现，确是前所未有的。

盛唐诗人的杰出代表是李白和杜甫。他们的作品都既有对太平盛世的歌颂，也有对社会弊端的揭露，都表现了忧国忧民的可贵精神，表现了他们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以诗全面、深刻、细腻刻画个人的内心世界，赞美

祖国的大好河山，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被誉为“诗仙”。杜甫以诗全方位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成为当时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被誉为“诗圣”，作品被称为“诗史”。李白的诗歌豪放飘逸，杜甫的诗歌沉郁顿挫，各有建树，各成楷模。他们是唐诗史上的“双子星座”。

这个时期有著名的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前者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谢灵运、陶渊明山水田园诗的传统，在以诗表现自然美方面不仅做到“形似”，而且做到“神似”。其中，王维的成就最为突出，作品被认为“诗中有画”。后者以高适、岑参、王昌龄为代表，他们继承和发扬了刘琨、鲍照边塞、战争诗的传统，多方面地表现“边塞”这个题材，既歌颂杀敌卫边的将士，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又反映了征夫、思妇对和平生活的渴望，对扩边战争的不满，还描绘了边塞特有的风光，令读者大开眼界。

除此之外，还有众多的名家足堪称道。例如“二张”（张说、张九龄），是初盛唐之间的宰相诗人，他们的部分作品内涵丰富，意境清新，饶有韵味，又都担负起了扶持新人，奖掖后辈的责任，被认为是初唐的殿军，盛唐的先导。又如“三王”（王翰、王湾、王之涣）二崔（崔颢、崔国辅）一贺（贺知章）等，都有名篇传世，而元结、顾况则以有别于盛唐风貌的创作出现在这个时期的末尾，并跨进了中唐的阶段。

总之，众多成绩优异的诗人在这个时期出现，他们的诗歌各呈异彩，共同形成了诗歌史上难得的辉煌。

盛唐诗歌的体裁样式齐备。古体诗（包括乐府、歌行）得到熟练的应用和发展，律诗走向高度成熟，其中排律成了重要形式，律绝的精湛运用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基础。

中唐时期（771—835）：

这是唐代诗歌的中兴时期，即再度繁荣时期。

这个时期的前半段，国家在大乱之后，元气大伤。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这三大社会痼疾，加上自上而下的政治腐败，使大量有识之士深为忧虑，相当多知识分子看不到国家的发展前途，大批诗人思想苦闷彷徨，情绪转向消沉。诗坛上也随之不景气，出现了在李白、杜甫诗歌极盛之后难以为继的局面。除了少数作品尚有盛唐风味之外，大量的诗歌虽然也多少带有忧患意识，但内容浮浅，气象单弱，诗人的注意力放在讲求形式韵度方面，整体上显得比较孱弱。刘长卿受盛唐“王孟”的影响，擅写山水风景，情调冲淡闲远，自诩“五言长城”，但语意与格局颇多雷同。韦应物颇多政治讽喻之作，又以擅写山水田园诗出名，在盛唐“王孟”之后，自成一家。但已难以与盛唐“王孟”比肩。这段时间，以诗人群体出现的是“大历十才子”。即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他们的作品多应酬和流连光景之作，间有社会生活的反映，也较浮浅，气格已大不如盛唐。要之，钱起、卢纶、李益是这段时间影响较大的诗人。

这个时期的后半段，随着王朝政治改革的展开，国家出现了中兴的局面。诗坛上也出现了活跃的气象，形成了在盛唐李杜之后另辟蹊径卓有成效的诗派：即以韩愈、孟郊为代表的奇险诗派（亦称韩孟诗派）和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通俗诗派（亦称元白诗派）。韩愈接受李白和杜甫的影响，用诗来全面地表达自己的生平经历和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深刻而细腻地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诗风浑厚奇险，被认为是唐代转变诗风的重要诗人。奇险诗派的主要诗人还有孟郊、卢仝、李贺、贾岛等。其中，在刻意求险、求怪方面，李贺尤其突出。白居易以儒家“诗教”为指导，继承杜甫诗歌现实主义传统，提倡写“新乐府”诗，用诗干

预社会现实生活，主张把诗写得通俗易懂。通俗诗派的主要诗人还有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此外，刘禹锡、柳宗元的诗也自成一格。他们共同开创中唐诗坛的新格局，使中唐诗坛几乎可与盛唐媲美。

晚唐时期（836—907）：

这是唐诗发展过程的衰落时期。

晚唐社会政治黑暗腐败。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激烈，使中唐以后朝廷逐渐走向衰微的局面更加不可收拾。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诗歌的繁荣已成了明日黄花。大量的诗作受已有传统的束缚，缺乏创新风貌。整个时期可与中唐著名诗人相比的只有杜牧和李商隐。

杜牧、李商隐（亦称“小李杜”）是这个时期前半段的诗人。他们带有唐代优秀诗人的品格，在忧国忧民中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表达了对国势衰落的忧虑，对个人怀才不遇、仕途坎坷的愤慨。在诗歌形式上，杜牧继李白、王昌龄、李益之后，成为晚唐七绝的圣手。其精心结撰的咏史绝句和抒情小诗，向来脍炙人口。李商隐则继承杜甫艺术传统，将七言律诗推向新的高峰。其精心结撰的“无题”诗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后代无数读者。

晚唐大量诗人，醉心诗歌创作，诗歌的总体内容有四个方面：（1）反映民生疾苦、官场昏暗、宦官罪恶、藩镇作乱以及农民战争等重大社会现实这类作品数量不多，但光彩夺目。（2）通过怀古咏史，隐含着对于现实衰败的无可挽回的感慨。（3）表现闺情、爱情、歌妓。（4）表现个人生活琐事见闻。这后二类作品数量很多，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逃避现实的空虚的精神态。诗歌的艺术倾向有两种，一种是追求秾丽绮艳，一种是追求清丽淡泊。主要诗人有许浑、温庭筠、韦庄、皮日休、聂夷中、

杜荀鹤等。

就总体而言，晚唐诗歌是整体唐诗的组成部分，它的光彩夺目部分同样具有极高的价值。

第二节 唐诗兴盛原因

唐诗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是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有利因素和文学本身发展的规律造成的。

（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为造就诗人提供了有利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环境。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初唐开始，国家就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盛世，经济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增加，国力不断强盛，唐朝成为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王朝。尽管后来出现了安史之乱，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没有直接遭到战争的破坏，随着北人避祸南下，财富相对地集中到江南来，使南方得到新的开发，经济得到发展，从而使全国的经济在战乱之后很快得以复苏，继续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上扬。有唐三百年中，长时间的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为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为国人提供了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良好条件，也为诗人漫游祖国各地、扩大视野、丰富创作内容提供了方便。

由于经济繁荣，财政收入增多，国家有较多的财力从事发展文化教育娱乐事业，形成了较好的培养造就人才的氛围。大量的诗人就在这种背景之下相继出现。

由于社会安定，国内南北文化交融比以往更加频繁。南北朝

时代形成的南方文风绮丽阴柔，北方文风质朴刚健的格局，在唐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南北文化互相吸收、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健康的成果，对诗坛万紫千红局面的出现也是一种促进。

这种强盛的国力，吸引了四邻各国前来与唐朝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正如王维诗中所写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相当长时间的自我封闭状态，为诗人扩大视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创造自己辉煌业绩提供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中外文化交流、歌颂中外友谊诗篇的出现。

（二）思想文化政策相对地有利于文化学术的繁荣。

唐朝的最高统治者都是封建专制统治者，他们的极权和专制就是束缚人才发展、妨碍文化进步的桎梏。从巩固政权的根本目的出发，有两方面的政策有利于文化学术的繁荣。一是科举取士，一是儒、释、道三家思想兼容并行。

隋朝以前，以“九品中正制”选拔人才，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隋以来打破了这种格局，推行了科举取士制度。科举考试中，以进士科最受举子欢迎。进士考试中，诗赋是必考科目。这就从政策上极大地调动了人们对诗歌写作与研究的积极性。写作诗赋成了入仕必备的素养之一。许多人为了中举当官，终生孜孜不倦吟诗作赋。如白居易“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岁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与元九书》）。李贺“七岁能辞章……每日出，骑弱马，从小奚奴背古锦囊，遇所得，书投囊中……及暮归，足成之”（《新唐书》本传）。苦吟诗人孟郊作诗几乎走火入魔，“裴回赋诗，而曹务多废”（《新唐书》本传）。贾岛也把作诗当成生活中的第一大事，说“一日不作诗，心源如废井”。在这样全国上下普遍重视诗歌

创作的年代里，出现了著名诗人，当然是完全可能的；诗歌创作数量空前增多，也是完全可以预料的。

唐以前，最强大的朝代是汉朝。汉朝刘彻（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为他的大一统事业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思想自由和学术发展。而唐朝统治者则采取宽松的思想文化政策，让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行，客观上使三家思想对社会都产生影响，从而出现了思想、学术相对活跃的局面。三家的互相争鸣、互相影响的过程也促进了学术和艺术的相对自由发展。唐代诗人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受了这三家思想的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杜甫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一生积极干预生活，忧国忧民，但生活的艰辛，仕途的坎坷，有时也使他产生了归禅、求仙的想法。李白受道家思想影响较大，轻视权贵，飘逸洒脱，但他一生中也曾执着于“安社稷”、“济苍生”的宏伟抱负。王维则受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以至于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但他早年也曾朝气蓬勃，“忘身辞凤阙，报国取龙庭。岂学书生辈，窗中老一经”（《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字》）。他们的思想状况直接、间接影响了自己的诗歌创作，这在客观上对诗歌创作出现万紫千红景象是一个有益的因素。

（三）各种学术、艺术的繁荣对诗歌的繁荣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唐代的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杂技以及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都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出现了一大批技有专长的行家，这对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诗歌创作不仅与诗人个人的气质有关，而且与诗人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有密切的关系。而个人的文化修养，除了个人的努力之外，与时代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唐代因其经济实力雄厚，因其统治者对文化建设的极大重视，确实为当时的文

人提供了较前代优越的学术环境。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当时编修、整理的前代经、史、子、集共有 53915 卷，成绩堪称辉煌；对儒、道、佛经典的整理笺注曾出现过高潮。而唐代学者个人的著述又有 28469 卷，仅类书一项，就有 17 家，24 部，7288 卷。其中包括了欧阳询主编的《艺文类聚》（100 卷）、虞世南主编的《北堂书钞》（173 卷）以及《玉藻琼林》（100 卷）、《初学记》（30 卷）等。大量类书的出现为文人文化修养和诗人写诗提供了教材和工具。《艺文类聚》就是唐高祖李渊于开国后的武德五年（622）下诏编写的，两年之后（624）就编辑成书。该书对当时人们以及对后代文人在创作中借鉴前人艺术成果提供了方便。就文学著作来说，对文人影响颇大的李善注的《昭明文选》，于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成书，尔后，唐玄宗时期的五臣注的《昭明文选》又广为流行。就语言学著作而言，唐李舟著的《切韵》和孙愐著的《唐韵》的出现，方便了文人写诗检韵。有关声律、对偶的语言学著作的出现，对于人们学习和创作律诗显然有所帮助。

就诗人个人而言，有的诗人兼通书法艺术，又是画家，诗画相得益彰。王维就是一例，他的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有的诗人说不上兼通别种艺术，但颇受兴旺发达的别种艺术的熏陶，对自己的创作产生了很好的作用。杜甫、白居易、李贺等写出了著名的表现音乐的诗篇，就是得力于当时音乐的繁荣和他们对音乐艺术的理解。韩愈等奇险诗篇的写作，与当时佛教壁画的出现和韩愈他们对佛教壁画的欣赏理解有关。大量的表现各种艺术活动和各种精湛艺术技巧的诗篇的出现，当然更是与当时各种艺术的繁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些传唱久远的七绝，如王维的《渭城曲》、李白的《清平调》、“旗亭画壁”中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等的诗篇，与音乐艺术的繁荣更有着紧密的依赖关系。从

艺术角度看，诗歌艺术与音乐、美术、舞蹈等各种门类的艺术有共同的特质，因此，其他各种门类艺术的繁荣和发达对诗歌艺术的繁荣昌盛必然起积极的作用。就文学本身来说，当时的散文成就也非常突出，小说也在崛起，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成就对诗歌创作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前代文学成就为唐代诗歌发展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任何时代的文化都是在前代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与前代的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唐诗的兴盛繁荣，也离不开对过去的文学遗产的继承和发扬。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其中有值得学习的经验，也有不少深刻的教训。唐代有作为的诗人都善于批判地继承前代的文学遗产，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就名家影响来说，唐以前已经有一批著名诗人成为唐代文人学习、借鉴的榜样。唐代著名诗人的成长过程明显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例如李白就继承了屈原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又注意学习“二谢”、鲍照、庾信、阴铿的诗作。杜甫则较多的接受三曹七子诗歌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又直接从汉乐府民歌中得到启发。王维、孟浩然受陶渊明、“二谢”的熏陶，高适、岑参受鲍照、刘琨的滋润。可以说，唐代名家无不以前代文学成就作为自己取得文学成就的基础。

就题材主题来说，严羽《沧浪诗话》中说的征戍、迁谪、行旅、离别的题材，以及今人所概括的惜时、相思、出处、怀古、悲秋、春恨、游仙、思乡、黍离、生死、咏物、山水、田园等等，在唐以前的诗人笔下，已经有了不少佳作。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了新的超越。例如爱国忧民这个最具有震撼力的主题，屈原的辞赋就为唐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营养和艺术营

养。

就创作经验来说，“风”“骚”是唐人多所借鉴的艺术宝库。“赋比兴”的艺术传统直接滋养着唐代诗人。先唐大量的具体的表现方法通过具体作品为唐代诗人提供了样板，为唐代诗人在创作上的新的超越起了先导和铺路的作用。先唐的诗歌理论著作或言论更是从理论上启迪了唐代诗人。例如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魏曹丕的《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等理论著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唐代诗人提供了创作的理论指导。唐诗中大量诗篇具有严羽说的浑厚的意境，正是对先唐大量诗篇在意境创造上的摸索、创造的经验加以借鉴之后形成的。

就体裁来说，唐代诗体大备，也是以先唐诗体发展为基础的。例如古体诗在先唐已经成熟，而到了唐代，在接受五言古诗成熟经验的基础上，七言古诗得到了新的发展，从先唐的个别篇章到唐初的数量不多而别开生面的歌行体诗的出现（如《春江花月夜》），再到盛唐的有较多排山倒海震撼人心的佳作的涌现，才算达到了成熟。又如新乐府诗就是在汉代“缘事而发”的乐府诗（可合乐而歌）的基础上，经魏晋时期的借乐府旧题写新时事（所谓“旧瓶装新酒”并依然可合乐而歌）的阶段，到唐代才出现了以新题写新事但不一定入乐可歌的“新乐府”。又如律诗，从先唐时就开始酝酿，到南朝，受骈文和永明声律论的影响，在诗句的声韵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规范，进入唐代，沈佺期、宋之问等人便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琢磨、创造、去粗取精，才把律诗的格式固定下来。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诗体自身发展的漫长的历史过程及其先后的承传关系。

第二章 初唐诗歌

第一节 “四杰”、“沈宋”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生活在唐太宗贞观中期以后至武则天当政期间，这正是初唐阶段。他们都以诗文齐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四杰”生活时期正是文坛上严重受齐梁诗风影响的时期。文人们“争构纤微，竞为雕刻”，几乎到了“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杨炯《王勃集序》）的地步。宫廷诗人上官仪作诗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因为地位显贵，其诗竟能风靡一时，号为“上官体”诗。从他现存的诗篇看，大多是描写宫廷生活的宫廷诗和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形式上追求华艳、婉媚，讲究对偶。但情不胜辞，分明是齐梁遗风。效其体者之作也不相上下。王勃等人登上文坛，也受到这种风气的熏染，但他们能意识到这是一种病态，不足称道，决心加以改正。他们以革新者的姿态驰骋于文坛，被闻一多称为“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唐诗杂论·四杰》）。

王、杨、卢、骆四人仕宦不显，但才华横溢，抱负不凡。他们的诗歌创作不为时流所左右。虽然他们的诗歌在形式上并未完全脱离齐梁遗风，但他们的诗与“上官体”诗相比，另有一种清新的气息。从题材来说，他们的诗突破了宫廷和应制的藩篱，接触了一些社会现实，例如士子的宦游，将士的赴边，上层社会的奢侈，弃妇、歌女、宫娥的内心痛苦等等。从诗歌的思想性来

说，比之“上官体”诗的应酬娱乐来，要严肃得多，所反映的作者渴望建功立业的进取精神和受打击排挤的无限感慨，也颇能引起社会上同类或相似处境者的共鸣。从诗歌形式上来说，除了艺术技巧之外，在五言律诗体制和歌行体诗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相对地说，王、杨以五律见长，而卢、骆以歌行显胜。

王勃（650—676），字子安，原籍太原，移居龙门（今山西省内），一生只活了27岁。他的《滕王阁序》是骈文中的佳作，向来受到称许。他诗思敏捷，才情纵横。有《王子安集》，存诗80多首。

王勃的诗多为五言律绝。《秋夜长》表现了对扩边战争的不满。《临高台》既反映了初唐长安的盛况，又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与荒淫。《铜雀妓》则表现了深宫歌女的不幸命运与痛苦心情。这类诗篇虽然为数不多，但已经在初唐诗坛上透出了清新的气息。王勃的五言律诗和绝句中表现游子情思与身世感慨之作颇为人称道。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当时诗人供职长安，是离乡远游，在外做官的人，而朋友杜少府正要离别长安到蜀川（今属四川）去任官。二人有相似的经历。王勃在送别友人，遥望那蜀地风光的时候，产生一种游子宦情，对与友朋的惜别格外珍重。但毕竟少年气盛，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这使诗里行间充满了壮志豪情，说出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警句，使本来的离别伤感，变得豁达豪放、乐观互励。“海内”两句，源自曹植的《赠白马王彪》：“丈夫志

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经王勃的提炼，成了千古流传的警句。同类题材的另一首诗《别薛华》写的却是另一种情状：

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

这是在西蜀送别好朋友薛华写的诗。当时王勃正经受着宦海风波，远离京城，迁谪西蜀，送别薛华，也就是客中送客。内心的愤懑凄苦通过“穷路”“遑遑”“悲凉”“凄断”“漂泊”“苦辛”等词语，得到充分的表达。末联更将对自己政治生涯的不可预知的忧虑作了含蓄的揭示。整首诗已经没有了上一首诗的那种豪迈格调，但却真实地表现了诗人的内心世界。这也可见王勃在构思意境、使用语言方面的工力。胡应麟评曰：“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著景物，而兴象宛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诗薮·内编》）至于他的五言绝句，也有类似的名篇传世。如《山中》：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当时诗人作客巴蜀，时属高秋，置身山中，面对长江，以江水的滚滚东流来映衬自己滞留异乡的悲苦心情，黄叶纷飞的环境进一步烘托出诗人的萧瑟和飘零。从诗的意境来说，这首诗可说已经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

杨炯（650—693?），华阴（今属陕西）人，早慧，但仕途并

不得意。曾任盈川令，有《盈川集》，存诗 30 多首。

杨炯擅写五律，以边塞诗在当时诗坛上为人称道。其上乘之作是《从军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诗中流露的爱国激情与立功壮志，是当时许多士人渴望立功边陲的真情实感的写照。诗中所写的受命赴边和战场情景也生动可感。末联“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既说出自己的心愿，也表现了同时代士子的价值观。整首诗给人一种节奏明快、气势磅礴的艺术感染力。类似的诗篇还有《紫骝马》：

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骝。蛇弓白羽箭，鹤鬣赤茸鞦。发迹来南海，长鸣向北州。匈奴今未灭，画地取封侯。

诗中所写的侠客矫健形象已经不是传统的游侠形象，而是具有爱国热情、希望到边陲去建功立业，获取封侯的热血男儿。

杨炯这类作品不仅在题材内容上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在诗的形式上也颇为用心。如《从军行》中除了首联之外，其余三联皆用对仗。《紫骝马》的中间二联对仗也十分工整。二诗在平仄应用上皆符合后来律诗的要求。这与王勃的五言律诗一样，对于促进当时律诗体制的定型起了推动的作用。

卢照邻（634?—686?），字升之，自号幽忧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一生不得志，又长年为病所困，以至残废。